

◎ 蒋介石证券投机案：出其优越之天资 周旋商场 每有测度 无不中的 而办事时精神勇毅，尤为他人所莫及。经营不半载，迭获巨利，竟达十数万元，俨然富商矣。

在以前的中国人眼中，四是一个圆满的数字，天有四时，地有四象 国有四维 礼有四德 甚至从西天传来的佛教中 也有四谛之说。

但到了近代之后，四就不是一个吉祥的数字了，这恐怕与国民党四大官僚垄断集团未成圆满的功德有关。

国民党金融集团的形成很难具体考证，但其中主要人物的经济活动是可以说明的。

蒋介石是国民党金融集团的政治保护人。从表面来看，他超然于投机经营活动之外，与经济事务并不尘染，但实际情况并不尽然。

中国股票市场形成较晚，但蒋介石却是最早的一批入市者。

大概是在 1916 年，深谙西方经营之道的孙中山先生为了筹措革命经费 派朱执信写了一份申请书交给“北洋政府”农商部 申请在上海创设证券物品交易所 经营证券、花纱、金银、杂粮、皮毛等，资金总额定为当时国币 500 万元。

对于孙中山的要求，“北洋政府”心有余悸。经办人不知交易所为何物 只好托称任何人都应当以法为据 法无此物 则难批复 干

方百计加以阻止。因此，对孙中山的呈文没有批准。这件事情也就搁置下来，孙中山先生也没有再继续争取。

这时，在政治上尚不得要领的蒋介石却对商道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尽管此时他只是张静江等人的一个小伙计，并没有表现出特殊的经营才能。

张静江是蒋介石在投机经营上的带路人。此人姓张，名人杰，字静江，有过传奇式经历。他在 20 岁时，便患骨痛症，致使双腿行走不便。不过，他却有一颗精明的商业头脑。他居然在巴黎开办通运公司，赚了大钱。1905 年冬，他回国后重返巴黎时，正好与孙中山同船，他仰慕孙中山，前去拜望，并表示可以资助孙中山革命活动。

他告诉孙中山联络暗号，并说以 ABCDE 为序，倘电报中写 A 即资助 1 万元，B 为 2 万元，C 3 万元，D 4 万元，E 5 万元。孙中山听罢，将信将疑。两年后，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时，同盟会本部经费匮乏，无计可施，想起了船上邂逅的那位奇怪的富贾张静江，便按联络密码往巴黎发电报，电文仅仅一个字，即“C”。几天后，果真从巴黎电汇来 3 万法郎，使孙中山吃了一惊。从此，孙中山的革命活动陷于困顿之际，便向巴黎求援，张静江有求必应。不久，张静江加入了中国同盟会，成了孙中山的密友。

过了一年半载，蒋介石等人因为经济非常拮据，在张静江的启发下，决定利用孙中山呈文的思路，着手办理交易所。为此，进一步与日本某政党所介绍的企业代表协商，初步形成了关于开办交易所的具体办法。

首先，蒋介石等人在上海组织了一个名叫“协进社”的秘密社团，由之出面具体进行组织谋划工作；其次是拉拢江浙财阀虞洽卿、赵家艺、盛丕华、洪承祁等人，聘请他们为该组织社员，以扩大力量；最后又由虞洽卿等再拉拢当时上海工商界中所谓知名人士

温宗尧、闻兰亭、李云书、张澹如、沈润挹、吴耀庭、顾文耀等共任发起人，草具文书，提出申请，并递交给北京的农商部，申请创设“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

不料，正在蒋介石、虞洽卿等人积极筹备之时，此事被南通商界巨擘张謇所探悉。他马上通电反对，使得这些筹办者感到颇为惊诧。

其实，这是有原委的。对于其中的“道”，张謇要比蒋介石等人内行得多。

听到虞洽卿、蒋介石等人要创办交易所的事情后，张謇感到很是吃惊。办证券交易所在当时中国商界是很超前的事情，土生土长的中国商人很少能有此创意，但他却是例外。不仅早有此意，而且正在着手筹划，没想到半路杀出个程咬金，自然是他所不愿看到的事情。

张謇非常清楚，真正的危险并不在于他由此多了一个竞争对手，而是他知道各西方国家的交易所均采用一区一所制，“北洋政府”若准许蒋、虞等首先创办交易所，别人就不能在同一区域内再办。

他在南通办盐垦多年，当时正种植棉花，而且大生纱厂也已开办起来，自己手中有花、有纱、有布，万事皆利于我，岂容他人染指分肥？

在他看来，以自己的名望和资信，只要自己坚持，这些小辈们即有天胆，也难如愿。有了这个信心，他马上向“北洋政府”提出申诉，坚决反对虞洽卿等创办交易所。

他的理由有二：“一是交易所既是一区一所，就不能多种经营，做了证券就不能再做物品；如单营物品，则做了棉花就不能再做纱布。二是交易所不能依靠外资作股本。”

在这样的情况下，虞洽卿、蒋介石等人虽有上海各业领袖和总

商会的支持，但农商部也碍于张謇的反对，很难批准他们的申请。

实际上，这是蒋介石、虞洽卿的多种经营与张謇的单种经营的商业权利之争 双方势均力敌 相持不下。

这时，蒋介石等人终于发现了转机。

在他们与张謇闹得不可开交之时，精明的日商已于 1919 年在上海日领事馆注册，在上海租界三马路开办了“取引所”（即交易所）蒋介石、虞洽卿便以抵制取引所为借口 电请农商部迅速批准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案。

在上海，蒋介石等人也秘密展开活动，试图先发制人。在他们的游说下，沪海道尹某只好打了一个密电给北京：关于虞洽卿申请创办交易所一案如再不批准，他们将在租界内先行交易，如地方官厅予以封闭，反会使日商取得专利。

这时的北京政权为直系军阀所控制，曹锟、吴佩孚不愿日本人以任何方式介入中国事务。于是，中国以股票为龙头的第一家综合交易所被批准。

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 1920 年 2 月 1 日宣告成立 理事长为虞洽卿 常务理事为郭外峰、闻兰亭、赵林士、盛丕华、沈润挹、周佩箴等六人 理事十七人 监察人为周骏彦等。交易物品原定七种 为有价证券、棉花、棉纱、布匹、金银、粮食油类、皮毛 但当时并没有全部上市。1929 年 10 月 3 日《交易所法》颁布以后 它便依法将物品中的棉纱交易并入纱布交易所；证券部分于 1933 年夏秋间并入证券交易所，黄金及物品交易并入金业交易所。

一般交易所的买卖是由经纪人经手代办的。经纪人在交易所中缴足相当的保证金，在市场代理客商买卖货物，以取得相应的佣金。每一家交易所的经纪人，多寡不同，有的数十个，有的一百多个。经纪人头上戴白布帽子，帽上各编有号码，以便能够识别。经纪人卖出买进次数不受限制，成交须经拍板员拍板，以拍定的价格

为计算标准 全场均须遵守 不得异议。

蒋介石、陈果夫、戴季陶等人成了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经纪人 牌号是“恒泰号”。恒泰号只是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经纪机构之一，由于财力有限，他们不是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股东，而是该交易所经纪机构恒泰号的股东。

恒泰号的营业范围，表面上是代客买卖各种证券及棉纱，资本总额银币 35000 元 每股 1000 元 分为 35 股。股东共有十七人 但由于各种原因，合同中多不用真名。股东和所占的股份是：吴侨记一股 吴子记三股 吴吉记一股 孙棣记二股 王慎记一股 王朴记一股 蒋伟记四股 小恒记二股 吟香记一股 陈明记一股 邱成记一股 刘俨记三股 朱守记一股 张弁记一股 张静记五股 张莹记三股 张秉记四股。

股东中的“蒋伟记”就是蒋介石的代号。在合同上各股东都在自己的名下盖章，只有蒋介石没有盖章，仅在“蒋伟记”名下签了“中正”的名字。小恒记是戴季陶的化名 吟香记是周佩箴的化名，张静记是张静江 张弁记是张静江的哥哥 张乃燕的父亲 张秉记是张秉三（名有伦，是张静江的侄子，早年与于右任在上海震旦书院同学 后来当监察院参事十多年）朱守记是朱守梅 吴侨记是吴侨之 吴子记是吴嘉谟 吴吉记是吴洁忱 孙棣记是孙棣三 王朴记是王子新 王慎记是王子恒 邱成记是邱成铎 刘俨记是刘俨廷 张莹记是张望徵。

这一班人多是江浙资产阶级、买办、地主和流氓之流。股东中以张静江叔侄兄弟占的股份最多，共有 13 股 为恒泰号全部股本 1/3 强，尤其是张静江名下占股最多。张秉三之所以当经理，和张家所占的股份比重是分不开的。

蒋介石居然也占了四股，大有不落人后的样子，其实不尽然。

这时的蒋介石并没有以后那样风光，可谓身无分文，一无所

有。他的 4000 元股本 是由张静江替他代交 让他捞回一把 以免他经常做伸手将军来借钱。此点有蒋给张的信为证：“日来闲居无事 常以弄墨自娱 愧无进步 不能当大雅一睐。七日教言 颇悉一是。代认恒泰股份 甚感 请为签字。”

投机舞台搭好了，蒋介石等人自然干起了在交易所的市场上“抢帽子”的投机游戏，纠伙联群、操纵市场。

由于交易所设在商贾云集的上海，又是中国第一家，因此，一时成为投机者的乐园，起初交易营业额很好。交易所股票称为本所股，也加入证券市场买卖。开始时每股价格在 30 元左右 到 1920 年春季已飙升至每股 50 多元 等到《物品交易所条例》颁布后 本所股市价已到 80 元 至年终时每股涨到 120 元。这时每股所欠缴的股款  $\frac{3}{4}$  即 37.5 元 已全部缴清 交易所已实收资本 500 万元。蒋介石等人初尝甜头，乐不思蜀。

协进社所有的 3 万股 戴季陶、张静江、蒋介石等最多只分给重要社员 1.5 万股 其余所存 1.5 万股早已卖到市场上去了。现在为了要缴四分之三的股款，戴季陶、张静江、蒋介石等又将日商方面做押款的 7 万股股票全部赎回而卖掉 3 万股。这样 加上前存 1.5 万股共 4.5 万股，以每股平均获利 60 元计算，共可获利 270 万元。除去日商押款 87.5 万元 还有 4 万股保留下来的股子 每股应缴 37.5 元 共需 150 万元 总共 237.5 万元 其余的 32.5 万元，当然就为蒋介石、戴季陶、张静江等所得。至于缴足 50 元的 4 万股股票 市价每股已值 120 元 共值 480 万元，也为蒋等人所有了。

真所谓空手人翻云覆雨 白手起家 凭空发了大财。

有人记述蒋的这段经历时说：“出其优越之天资 周旋商场 每有测度 无不中的 而办事时精神勇毅 尤为他人所莫及。经营不半载 迭获巨利 母子相加 竟达十数万元 俨然富商矣。”

后来，交易所的一些人认为股票价格已达到饱和点，不能再有

所发展了。于是，一场分裂势不可免，很多交易所创办者纷纷撤资，调整投资方向。

正当交易所的主要人物正在各谋发展时，蒋介石、戴季陶、张静江等人仍然以为他们有实力，手头握有每股 120 元市价的 4 万股股票，因而继续大做本所股买卖。

1921 年初，本所股每股市价已由 120 元抬高至 160 元，到年终时竟涨到每股 200 多元，真如脱缰之马，横冲直撞。蒋介石不禁喜不胜收，暗笑出走者不识时务。

交易所原来订有 120 余条的营业细则，规定卖主或买主应缴各种证据金，以便防止卖主到期不交货和买主到期不缴款，规定极为严格。

但这时蒋介石等人不仅不缴证据金，反而强迫常务理事郭外峰、闻兰亭等收受空头支票，充作现金。这时，现货与期货的差价越来越大，差金打出极多，导致会计上的现金大量支出。蒋介石等人开始感觉到恐慌。

原来，人们眼见得交易所利既快又多，于是，搞交易所的人接踵而起，到 1921 年夏秋时达到顶峰。物极必反，交易所数量越来越多，光怪陆离，问题百出，已完全失去了“平准市价”的作用，终于酿成 1921 年的信交风潮，许多交易所纷纷倒闭。上海交易所也不例外，拖延到 1922 年 2 月，就被宣告“死刑”，大量股票一旦变为废纸，交易所的大富翁骤然变为穷光蛋，蒋介石自然难逃厄运。

但蒋介石毕竟不一般，他抓住一次机会，利用政治手腕成功地使自己解了套。

交易所监察人周骏彦是蒋介石的同乡、老师，此时因套利而欠债 20 万元，到处被债主所逼，非 2 万元不能逃脱，急得他两次跳黄浦江。一天夜里，周到交易所理事魏伯桢处，要魏设法救他。魏此时也是套牢之身，哪有钱救他？

这时 蒋介石等人的救命稻草来了。与交易所合伙的日本商人又汇来 100 万元，交易所的负责人打算开股东会讨论交易所复业问题。了解内情的魏伯桢正在打这笔钱的主意，见周末，突然有了办法：把自己所持有的股票先在交易股东名簿上过 100 个新户头，然后叫庄之盘 字莘墅 奉化人 和魏在日本同学 雇 100 个人作为股东，在交易所股东开会时到会场去，质问交易所负责人关于交易所 500 万元资金和各经纪人保证金及各种交易所缴的证据金的用途，交易所负责人如果派人出来和自己谈判，就有文章可做了。

周骏彦听了这个打算后，拿不定主意，当晚就找蒋介石咨询。蒋介石这时也是负债累累，情况并不比周骏彦好多少，可谓同病相怜。一听到这个解套的主意，自然大喜过望。第二天就跑来找到魏伯桢，诚恳地向魏表示，自己经济上现在实在没有办法，愿意同魏合作。

多一个精明的帮手，魏自然不反对。魏当即问蒋介石希望得多少好处 出乎他意料的是 蒋胃口并不小 他说希望得 20 万元。魏很是恼火，当场回绝。因为日本汇来的款一共只有 100 万元 现在周骏彦想要 2 万元 魏对此并没有十分的把握 没想到蒋介石跑来一句话就要 20 万元 怎么能与他合作呢？

不料，蒋介石并不是等闲之辈，他想参与的事是很难不让他参与的 回去之后就对魏来了一手“釜底抽薪”。他暗地悄悄送给这次行动的关键人物庄之盘 1000 元 对之晓以利害 要求同意自己入伙分赃。

庄之盘对蒋的能量是了解的，对之无不言听计从。他马上找到魏伯桢：“瑞元 即蒋介石 到你这里来表示合作 你怎么回绝他？”“你初到上海 还不懂上海规矩。虞洽卿不是弱者 在租界上闹起事来，巡捕房不能不管，这就一定要通过法租界的黄金荣。瑞元同黄金荣有交情 你不同他合作 恐怕不容易成事。”

知道了蒋的这层背景，魏感到这样下去对自己没有任何好处，表示同意蒋介入。在蒋的授意下，庄之盘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如果事情搞成功，拿到的钱先救周骏彦的命，其次给蒋介石部分资金供他去广东之用，剩下的钱大家都有好处。经过一番讨价还价，魏只得同意这个办法。

股东会开会前，庄之盘所雇的 100 个人全部到位，每人发一点好处费，又加发了每人 2 角的酒钱。待酒醉饭饱后，由庄之盘领进交易所股东会会场，坐满了前几排。会议主持者虞洽卿一看苗头不对，心知有异，就宣布会议延期一天举行。虞当晚请李征五，李在辛亥革命时任沪东光复军统领，他的部下有张宗昌，以后在法租界当“大亨”，商量对付办法，许诺交易所将送他 5000 元。李征五当场拍胸，也找了一百来个人与魏、蒋等周旋。

蒋介石较早得到了这个信息，看到情况有变，知道自己不是虞的对手，马上叫庄之盘“先行退兵”。眼见解套在望，庄不同意就此罢手，两个人协商不成，就闹到大东旅馆来找魏伯桢。经过谈判，魏认为应从长考虑，李征五是熟人，可以做他的工作。

而蒋介石此时已经决定反水，他私下找了叶琢堂，叶是金融界大亨，他在开赌场时与蒋有交情。蒋请叶琢堂出面找虞洽卿，称自己并无意与他做对，只是现在经济上困难，没有法子去广东，要虞帮个忙，出点钱，由蒋出面将事情摆平。开始时虞很气愤，说蒋搞垮了交易所，还要捣蛋，不能同意。最后谈判结果，虞答应可由交易所拿出 6 万元，可以给蒋一部分，但要在蒋离开上海的那一天才能给钱。

蒋随即到大东旅馆把他的活动情形告诉魏伯桢。魏见蒋介石已独自将事情办好，尽管很恼火，但没有任何办法，只好顺从蒋的意见。

第二天，蒋介石拿着自己所分到的 4000 元钱，结束了在上海

的经济投机，开始了他去广东的新投机。

上海的金融投机活动对他不无益处，他带着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开始了军事统一中国的行武生涯。与其他赳赳武夫不同的是他在南京政府成立之初就将手伸到了经济的核心——金融领域，立即开始了国民党金融帝国的创建。

辛弃疾在《生查子·题京口郡治尘表亭》中曰“悠悠万世功，矻矻当年苦”当七年后蒋介石成为南京政府的主人冠盖云集重回上海滩时，他的心情一定大不一样。

◎ 孔祥熙投机案：在黄金政策的幌子下翻云覆雨作浪兴风又不知制造了几多暴富。这种暴富惟有制造消息的权贵才有十足把握。试想开战停战至于今日，一会儿宣布黄金国有，一会儿解除国有恢复自由买卖，一会儿实行平衡买卖，一会儿又实行官价平价，而且每次变动前后市场总是谣言四起作浪兴风。最后谣言都成为事实则其内幕如何也就可想而知。

抗日战争时期，当贺耀祖任重庆市长时，一天忽然接到蒋介石的密令，要他立即将藏在重庆的几个仓库封起来，听候处置。说这几个仓库中可能存有违禁货物。

蒋介石直接给自己下达“手谕”这是极不寻常的，贺耀祖知道货主肯定不是一般的人物。于是，他与手下人研究可以具体办理查

封的人，但找来找去，谁都似乎面有难色。

经过再三考虑，贺耀祖决定让自己的秘书吴浩宇亲自持“手谕”办理此案。临行前，他再三叮嘱，事关重大，一定要审慎进行，万勿出事。

吴浩宇是贺耀祖比较信任的人，江苏武进人，上海大学毕业，曾师从于国民党元老级人物于右任。经于介绍先到南京外交部，后转到文教部门，最后调到重庆市政府。先做视察，后来升为简任待遇的秘书。在国民党的官僚中此人算是办事认真，较为清廉。

吴浩宇按照蒋介石“手谕”中提供的线索，进行了一番深入细致的调查，终于找到了这几个仓库，查清了仓库里的货物内容，原来都是战时紧俏的物资，如西药、呢绒、布匹等，总价值达 4000 多万元。

更重要的是，他还经过认真调查，终于查清了敢于如此囤积居奇的仓库主人——不是别人，正是国民党豪族集团中坚人物孔祥熙。

这使他感到大为惊诧，既然如此，蒋介石为什么要派人来查孔祥熙？

带着这样的疑问，他想起贺耀祖的提醒，行事不得不更加小心。

虽然他是带着警察去的，但并不想立即以武力强行封存物资，而是希望与对方谈判交涉一下，适当缓和一下气氛，摸一摸对方的态度，再决定下一步。毕竟豪门之事多奥妙，谁会突然跑出哪路神，这点经验他还是有的。

当他拿出蒋介石的“手谕”，并向仓库经理说明自己的调查结果时，那位周经理显然没有思想准备，一时目瞪口呆，不知所措。

过了好大一会儿，对方缓过劲来，向他表示：“先生所说不错，我们积极配合，请先生到里面稍稍坐一下，我请示一下老板，马

上办理移交。”

这正是吴浩宇希望他做的，将对方的大老板调出来，将事情完全挑明，自己也向自己的老板交待。如果事情在两个大老板之间直接解决，自己就可以金蝉脱壳了。官场风云瞬息万变，谁知道其中隐情？

时间不长，那位周经理从里屋出来，只是一改刚才的窘态，变得春风满面。他笑着对吴说：“我请示过了，老板愿送 60 万元给您作茶资，并批示我吴先生清廉而精明，实为市府第一好官，要我诚恳地款待呢！”

虽然态度变得突然，但吴浩宇早有思想准备，料定对方的老板确实不一般，竟能在如此短时间内，将自己的背景了解得这么清楚。

既来之，则安之。不管如何，自己毕竟是拿着蒋介石的“手谕”来办案的，不办到底就是失职，回去也不好交代。于是，他安闲地说：“贵老板讲我清廉，可也不见得，但要钱切忌少，如有个三四千万，我是要的。”

“这样不是要我把全部东西都交出去吗？我知道先生是武进人，鄙人是宜兴人，都是江苏老乡，就算是自己人，您可得多帮一下。您也过于节约了，由我做主，再送个上等西装整套，当是换季，如何？”

见这些办法都无效，周经理灵机一动，装出一脸无可奈何的样子说：“好了，我看先生是雷打不动的，我着实佩服，只有将东西全交给先生了。这样，我们边吃边谈，我把仓库的明细账都告诉你，你好一一接收。”

吴浩宇正好想多套出一些情况，就坐在饭桌旁。

不容吴多说，周经理捧上酒杯，讨好地说：“您不要钱，也不要西装，我敬佩得很，特请不如相逢，今天我们既要办交代，让我们痛

快地饮三杯 饭后您贴封条 准我带行李走。”吴酒量很大 在一般场合完全可以应付自如，此时见他开始喝，也随之饮了两杯，准备让周酒后吐真言。

哪知这一次，他是彻底失算了。原来酒里有药，他很快醉倒在地。

原来，当孔家得到周经理的电话后，孔二小姐主张把吴浩宇干掉 再收拾贺耀祖。但孔祥熙坚决反对：“天没有塌下来 何必如此极端 不会想一点办法吗？”

这就是当时盛传此事时所谓‘称同乡 饮三杯’做法的由来。

等吴醒来时，发现自己正躺在枣子岚自己的家中。太太送过热手巾擦脸 他惊问：“你怎么也来了？”

其妻忧伤地说：“你真被蒙在鼓里了 去查封孔家仓库 却先叫警察离开。人家把你灌醉后，就用轿子把你送回来，一面把东西搬光 看你如何复命！”

第二天 吴浩宇沉着脸去见贺耀祖 还未开口 贺就同情地说：“老吴 你好险啊 入虎穴而平安回来 真是吉人天相！”

“那么 我还要作书面报告吗？”

贺答：“事情我全清楚了 你是好人 工作也做到家了。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呀！你口头报告一下就可以了。这几天允许你回家休息几天 养养精神 过两天再来办公吧。切记 最近几天不要像前几天那样到处乱跑。”

事后，贺耀祖将此事经过向蒋介石作了报告。奇怪的是，蒋似乎已有所闻，但并未深入追究，好像从来没有那份严办“手谕”一样。

这只是发生在孔祥熙身边的一个小案而已。

过去流传着一种说法：“蒋家天下陈家党 宋氏兄妹孔家财”。可见 在国民党的四大家族中 孔祥熙最精明 是最有钱的。

孔祥熙最忌讳别人说他在当官之前没有钱，无非想藉此表白自己的清白。

对于像他这样一言九鼎的人物，暂时遮掩一下是不难做到的，但情况似乎并不像他所表白的那样。

孔祥熙(1880—1967)山西太谷人。孔童年时因家境困窘，无力求学，免费就读于美国人主办的教会学校。1901年留学美国，获得欧柏林大学和耶鲁大学学士、硕士两个学位。回国后，创办铭贤学校，自任校长。同时经营祥记公司与裕华银行。武昌起义时，山西奋起响应。孔出任山西中路民军司令，继而担任山西都督阎锡山政府参议。1924年赴粤，任广东革命政府财政厅厅长、实业部长等职。

1933年4月，孔以国民政府委员的身份被蒋介石任命为中央银行总裁，同年11月任财政部长。1937年“抗战”爆发后，一跃而为国民党政府的行政院长。1939年为副院长。在八年“抗战”中，身兼三要职的孔祥熙，掌握着行政、财政、金融大权，为国民党四大家族官僚资本聚敛了巨额财富。

抗日战争时期，以孔祥熙为首富的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迅速膨胀，首先是从金融业的垄断开始的。

“七七事变”以后，作为财政部长的孔祥熙从欧洲回国，不久即在武汉成立了“四行联合总处（即中、中、交、农四行联合办事总处）”，由孔担任“总处”的理事会主席，后由蒋介石任主席，孔任副主席兼常务理事。

这标志着他已经成功走向了官商结合的顶峰。

“四联总处”的成立，本来是为了联络各行业的，但后来却成了“四行”之上的一个决策机关。1939年9月颁布的《战时健全中央金融机构办法》中规定，“四联总处负责办理政府战时财政金融政策有关各特种业务”。“主席总揽一切事务，在非常时期内对中

央、中国、交通、中农四行可为便宜措施 并代行其职权。”

从此，“四联总处”成了四大家族垄断全国金融业的一个核心机构。为了有效地控制全国的金融业，形成全国的金融网，孔祥熙在西南、东南各省增设了 60 多个分行，在西北各省增设了 150 多个分行。

这样，就大大加强了“四联总处”对全国地方银行和私人银行的控制和监督。

财政部指定由“四行”人员负责考核各地方银行的业务，检查其账目，必要时由财政部派人直接调查。

1941年7月，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颁布《货币统一发行办法》后，中央银行完全掌握了纸币发行和集中准备的特权，中央银行成了银行的银行，国家的银行。四大家族为了更有效地控制其他三行 将三行中的官股迅速增加。据统计 在“抗战”头四年当中，“四行”的资本增加了 6倍。“四行”之外币与黄金的储蓄，1940 年仅占全国银行蓄储的 1%；1942 年就上升为 16%；到 1945 年 6 月已增长到 75%了。

根据已知孔祥熙家族的有关金融、工矿和公司财产估计，总数要比宋子文多，约在 1000 万至 2000 万美元之间。

当时上海出版的《经济导报》第 96 期刊登刘康的文章说：“孔祥熙的私人资本，本质上是商业资本，他的金融机构只是商业资本的保姆；工业资本则多是他人依附或部分投资或公私合营”。

除了在国民党政权体系内部进行经营活动外，孔并没有放松其家族经营阵地。

孔祥熙经营银行不像宋子文那样藏头露尾，而是直接公开。这是他官商结合的一个特色，恐怕能像他这样操作的官僚并不多。

孔家独立经营的主要金融机构是山西裕华银行。

该行于 1915 年先在天津开业，名义资本 200 万元，实际没有

这么多。据说，孔祥熙创办山西裕华银行前，他所办的祥记公司在为美商美孚油公司推销煤油，要有一家银行担保。而孔家又找不到合适的银行担保 就自己在天津亮出了“裕华”的牌子。

孔祥熙曾自称此行来头很大，是由原来的“志诚信”票号改组而来。事实上，志诚信早已关闭了，只是骗骗美国人。

孔祥熙担任了几年工商部长后，口袋逐渐丰满起来，加上日本强占了华北 形势大变。

1937年孔祥熙把裕华银行迁到了重庆，资本增加到 2000 万元。“抗战”期间山西裕华银行发展很快 并得到蒋介石的信任和支持。1939年蒋介石决定把“抗战”初成立的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四家银行联合办事处改为“四行联合办事总处”，负责办理政府战时金融政策有关各特种业务，成为全国金融垄断机构的总司令部，蒋介石亲自担任该处主席。

当时“四联总处”就设在重庆的山西裕华银行内 具体业务由孔祥熙的女儿孔令侃主持。可见山西裕华银行所处的重要地位和孔家的势力了。

裕华银行经营方法是投机，是一家有名的“透支户”，1941年的透支额就达 3000 万元。他利用透支来的钱去抢购黄金，大发国难财。当时报载文章说：“黄金市场 西帮是大主顾 他们要买 就是整砖（400两）”；“西帮要买 金价就涨 西帮要放 金价就跌”。这个“西帮”就是指山西裕华银行。

“抗战”胜利后 山西裕华银行由重庆迁到上海四川路上 资金增加到 1 亿元。该行的要员有人给他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孔家儿女 如孔令侃、孔令仪、孔令杰、孔令伟等兄弟姊妹 第二类是孔家的门生亲友，如总经理武渭清等。第三类是孔祥熙的好友们。这家银行可说是代表了孔祥熙的金融面孔。

孔祥熙在为四大家族完成全国金融控制网的同时，利用金融

手段施展了各种手段聚敛财富。综观孔祥熙的历史，不难看出他发家致富的手段：

一是垄断金银兑售。

1935年国民党政府公布的《金银兑换法币办法》规定金银一律收归国有。仅此一项，他们就搜刮了民间金银4亿余元。1939年9月15日突然宣布黄金由“四联总处”附设的“金银收兑处”收兑，民间不得私存。于是又收兑一大笔金银。经过多次收兑，四大家族掌握了大量黄金之后，于1943年突然又宣布准许黄金自由买卖。同时，他们还从美国运来两亿美元的黄金，交给中央银行抛售。一年以后，“四行二局”忽然举办所谓“黄金存款”业务。在这些戏法式的变换中，以孔祥熙为代表的权贵们，不但把手中的大量法币变成了黄金，而且在黄金抛售中又大捞了一把。正如《周报》杂志上揭露的那样：“在黄金政策的幌子下，翻云覆雨，作浪兴风，又不知制造了几多暴富。这种暴富惟有制造消息的权贵，才有十足把握。试想开战停战至于今日，一会儿宣布黄金国有，一会儿解除国有恢复自由买卖，一会儿实行平衡买卖，一会儿又实行官价平价”，而且“每次变动前后，市场总是谣言四起，作浪兴风。最后，谣言都成为事实，则其内幕如何，也就可想而知。”

二是购买军火，套取佣金。

在国民党执政时期，连年不断的战争使无数人死于非命，但也使少数权贵们从中得到了巨大的实惠。

军火采购就是油水相当大的一个差事。战争养肥了一批掌握采购大权的国民党军政官员。据说，何应钦是较早发现其中奥秘的人。身为国民党政府军政部长的他，手中握有购买军火的大权，自然是在这一方面发了一笔横财。当时，就曾有人指责何应钦是贵州首富。向国外订购军火需外汇，而外汇由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掌握。军火价款要由宋子文向外拨付，军火运抵海关，也需要由